

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第十一期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八日

纪念刘英同志牺牲四十周年专辑

目 录

峥嵘岁月 战斗生涯

——纪念刘英同志……………郑嘉顺（1）

高尚的阶级友谊

——纪念刘英同志殉难四十周年……………龙 跃（10）

缅怀刘英同志……………顾春林（14）

刘英同志被捕前后……………丁魁梅（19）

刘英同志革命事迹片断……………程美兴（21）

忆刘英烈士二三事……………刘 先（25）

难忘的往事……………廖义融（29）

继承革命传统 争取新的胜利……………刘锡荣（32）

《刘英同志生平大事年表》……………黄书孟 张继昌（37）

刘英同志在浙江省第一次党代大会上的开幕、闭幕词（转载）…（46）

珍照荟萃：怀念刘英同志……………（插页）

编 后……………（49）

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第十一期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纪念刘英同志牺牲四十周年专辑

目 录

峥嵘岁月 战斗生涯

——纪念刘英同志……………郑嘉顺（1）

高尚的阶级友谊

——纪念刘英同志殉难四十周年……………龙 跃（10）

缅怀刘英同志……………顾春林（14）

刘英同志被捕前后……………丁魁梅（19）

刘英同志革命事迹片断……………程美兴（21）

忆刘英烈士二三事……………刘 先（25）

难忘的往事……………廖义融（29）

继承革命传统 争取新的胜利……………刘锡荣（32）

《刘英同志生平大事年表》……………黄书孟 张继昌（37）

刘英同志在浙江省第一次党代大会上的开幕、闭幕词（转载）…（46）

珍照荟萃：怀念刘英同志……………（插页）

编 后……………（49）

峥嵘岁月 战斗生涯

——纪念刘英同志

郑 嘉 顺

刘英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

刘英同志于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直在红军中工作。一九三五年初，他和粟裕同志奉命组成红军挺进师来到了浙江，这以后，刘英同志就在浙江，特别是在浙南度过了他的革命生涯。他对浙江党的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军挺进师到浙江时，面临的局势是严峻的，甚至可以说是险恶的。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侵吞我国东北全境。随后，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蚕食整个中国。而当权的国民党政府却倒行逆施，仍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求和，步步退让，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同时，我党在左倾路线错误领导之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了，主力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作长途的战略转移。而且在遵义会议之前，长征中的红军又遭到重大的损失。挺进师入浙之时，红军还在长征的途中。这时候，祖国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之秋，民族在危急之中，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窝，是江浙财阀的重要地盘。诸如陈立夫、陈果夫、陈诚、戴笠、胡宗南、邱清泉等，都是浙江人。这里是蒋家王朝的后院，反动势力根深蒂固。我党在浙江的组织于三十年代初几乎被破坏殆尽。一九三〇年全省唯一的一支革命部队——中国

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虽然高举武装革命的大旗，纵横驰骋于浙南十多个县，影响深远，但在一九三二年失败了。这期间浙江同样处于革命低潮，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红军挺进师入浙时，仅五百多人，枪四百余枝，而当面的敌人仅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就有六个保安团、十五个独立大队，加上驻浙江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多如牛毛的自卫队、民团等，敌我兵力极为悬殊，至于武器装备、弹药供应和通讯、后勤、战勤等条件，更不可同日而语。挺进师在这样的条件下，深入敌后，在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区，点燃革命火炬，开展游击战争，高举抗日、反蒋的革命旗帜，牵制和消灭敌人，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红军挺进师受命于危难之时，任重而道远。作为师政委、师政治委员会书记的刘英同志和师长粟裕同志，压在肩膀上的历史使命，何止千钧！

以刘英、粟裕同志为首的挺进师全体指战员，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转战于浙闽边和浙江数十个县，配合和支持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在浙江立定了脚跟，成为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根据地之一。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牵制了国民党军约十万之众，其中正规军七万多。抗日战争爆发后，刘英同志亲自与国民党代表谈判，达成了和平协议；在粟裕同志率领挺进师主力开赴皖南之后，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的工作和群众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加紧反共，局势逆转。他领导浙江全党执行中央制定的荫蔽精干政策，转入地下，为党保存和积蓄了力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党的恢复、建立、发展，主要应归功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广大党员群众，但它与刘英同志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浙江党组织成立较早，二十年代初，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地都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二九年四月省委建

制取消后很长一段时间，浙江省没有省委一级的组织。挺进师入浙后，一九三五年十月建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撤销，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一九三九年七月召开了我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浙江省委。都是刘英同志任省委书记。

刘英同志虽然在一九四二年牺牲了，但浙南特委在刘英同志生前奠定的工作基础上，坚持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四年占领温州时，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浙南游击根据地包括十八个县的全部或一部，人口约三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人枪上万。在大军渡江南下的影响下，我们争取了国民党二〇〇师及浙江保安第六团等起义，解放了十三座县城，迎接野战军主力南下。当年刘英、粟裕等同志领导创立的根据地终于开花结果。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干部，正在全国各条战线上为四化积极工作，其中很多人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责任。

红军挺进师入浙之后，即到了我的故乡——福鼎。革命的烈火燃遍浙闽边境，连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在革命火焰的熏陶下，也参加了地下活动，之后又光荣地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在刘英同志身边工作，亲聆教诲，而且从老同志那里听到许多刘英同志的事迹，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刘英同志虽然牺牲已经四十周年了，但他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光辉榜样，他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首先，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言行处处以党的最高利益为标准，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他总是在党最需要、而且最艰险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地工作。刘英同志有两次都有可能离开浙江。第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浙南根据地，向刘、粟传达中央指示，决定挺进师主力开赴皖南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央指示：“浙江地位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南坚持。”于是刘英同志留下来了。当时，南方八省十四个根据地中，除琼崖之外，所有红军部队都到了前方，组编为新四军，这些根据地的主要干部也都到了前方，唯有浙江的两位主要领导人中的刘英同志留下了。另一次是一九三九

年，在第一次省党代大会上，刘英同志被选为参加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且带领浙江省的其他代表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准备出发到延安去。同年冬，中央以毛泽东同志名义发来电报：由于国民党加紧反共，且浙江地位重要，主要领导人不能离开，指定刘英同志不去延安，留在浙江。这两次都是中央从战略高度出发作出的决定，也是对刘英同志的重视和信任，对浙江的工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刘英同志也没有辜负党中央的重托，确实打开了浙江的革命局面。

一九四二年二月，刘英同志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全省各地党组织和共产党员都十分沉痛、焦急，党中央和浙江党组织千方百计想把他从敌人的虎口里营救出来。但他在狱中所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浙江党的组织和同志们在省委机关被破坏后如何继续坚持斗争。为此，他通过一切可能把他的希望和坚持斗争的意见传给战友。他在狱中寄给他的爱人、战友丁魁梅同志的信中引用裴多菲的诗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表现出共产党员高贵的品质。

刘英同志政治上十分敏锐，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特别是“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对此，在粟裕同志著的《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挺进师组成时，中央在原则上指出要开展游击战争，但实现并具体完成这个战略转变，理所当然地要由刘、粟来担当。挺进师部队的编制包括司、政、供、卫机关在内，都短小精干，服从这一战略要求。挺进师一反北上抗日先遣队专打硬仗、大仗的正规战作法，部队时而分散，时而集中，主要是分散打游击，刘、粟二人也经常分开行动。在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各级指挥员也都能灵活机动地作战，经常是在与师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自为战，取得胜利，打开局面。同时，挺进师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因

此，在国民党军队和党、政、警、宪、特等反动势力的“围剿”之下，仍能左右逢源，无往不克，消灭敌人，壮大自己。

另一次使所有同志都很钦佩的战略转变，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一九三六年，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无法得到中央指示和全面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仅仅依靠传入根据地的数量有限的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刊，来推测与捉摸形势发展的脉络。当时从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上，看到红军到达陕北、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华北危急等消息，看到了宋庆龄、马相伯等签名发表的救国纲领，从这些极不完整的零星报导里，刘英同志敏锐地觉察到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党中央的政策必将作重大的转变。他立即根据这些动向，亲自编写宣传材料。同时，立即着手调整政策和转变口号。如对乡镇保长由镇压转为争取；欢迎进步士绅与商人参加抗日队伍；将欢迎白军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穷人不打穷人”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等。而且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即与浙江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同年八月，省委与上海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才陆续看到了中央的文件，证实了省委当时实行的战略转变，与中央部署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浙江国共和平谈判、挺进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等，是符合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工作进展很顺利。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战略、政策思想教育抓得早，抓得好的关系。

这两次战略转变，都是在远离中央、甚至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实施的。从这里，鲜明地看到一位高瞻远瞩、具有高度战略洞察力和胆略的革命家的形象。

刘英同志能很好地做到政治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这在一九三七年与国民党谈判时表现得很明显。当年四月第一次谈判时，芦沟桥事变还没有发生。谈判之前，刘英同志就估计到和平的条件并不成熟，国民党无非是企图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对谈判并无诚意。但为了揭露其阴谋，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

们仍旧去谈判。果然，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提出要收编我们的部队，政工人员集中南京训练另行分配工作的方案。我方代表根据刘英同志的指示，断然加以拒绝。九月间第二次谈判时，条件成熟了，刘英同志亲自参加谈判。双方停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而且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主动放弃了建立“闽浙特区”的要求，使和谈顺利达成协议。而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将红军部队编入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并开赴乍浦守海防，实际上妄想把我军一口吃掉的建议，刘英同志坚决地加以拒绝，并申明我方部队的行动，一定要请示我党中央才能决定。这样，既达成了协议，又保持了党和军队的独立性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体现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

在一些小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刘英同志在这一方面的修养。在抗战初期，刘建绪曾对我党一个干部提出，不得在他们的军队里发展党员。因为牵涉到原则问题，这个同志当时不予答复。当他向刘英同志汇报时，刘英同志笑道：你当时就可以回答他——只要你们不拉共产党员当壮丁，自然就没有人进去啦！这一回答，很能说明刘英同志的机智。刘建绪如果听了，也会瞠目结舌、无言可答的。

刘英同志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去完成任务。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入浙，起到革命播种机的作用。全师有五百多位干部和战士，是打开浙江革命局面的基本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与此同时，刘英同志十分重视培养和团结本地干部。挺进师之所以在广阔的浙闽大地上生根、发芽、壮大，从而汇成不可战胜的革命洪流，就是因为刘英同志善于把外地和本地干部、军队和地方干部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缘故。

刘英同志十分重视和珍惜浙闽地区原来的革命力量，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浙南革命游击根据地是以红军挺进师为主，汇合了鼎平地区的郑丹甫、林辉山等同志，以及平阳地区叶挺鹏、黄先河、吴毓、郑海啸等同志建立起来的。红军挺进师入浙犹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使浙江的革命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刘英同志经常对挺进师的同志说：我们从江西来，人生地不熟，只有依靠和团结当地革命力量，才能战胜优势的敌人，在浙江站住脚。

他对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出身的干部的情况也都很熟悉，并且很善于发扬他们的优点。他对大革命时代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叶挺鹏、郑贤塘等都很尊重，他称叶挺鹏、郑海啸同志为“农民领袖”，对他们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吴毓、陈铁军等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以及抗战以后参加工作的干部，他也很信任，放手让他们工作；对中央苏区出来的干部，也很器重，如一九三九年，他在金华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时，特地派人到根据地接龙跃同志出来，一起参加汇报。挺进师和浙南游击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红旗不倒，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是刘英同志团结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善于发挥其特长的结果。浙南特委的领导班子就是在刘英同志的正确指导与亲自关怀下，健全和加强起来的。刘英同志牺牲之后，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坚持、发展和胜利，以历史事实证明刘英同志选择、任用干部的正确性。

刘英同志知人善任的好作风不仅对干部，而且对战士都是如此。如当年一个国民党八十师的俘虏兵，机枪打得很准，刘英同志深入地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之后，将他带在身边，有时直接掌握这挺机枪，指挥发射。对此，我们这些根据地出来的小青年，有时也在背后叽叽咕咕。但事实上，这位旧行伍出身的同志，在每次战斗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表现很好，最后为革命而英勇牺牲。刘英同志是能够从本质上估量一个人的作用的。

刘英同志对干部非常爱护。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最后八个月，敌人集中十万兵力，“围剿”浙南游击根据地。刘、粟决定化整为零到外线活动。一天，他们二人深夜不眠，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进去时，刘英同志正在踱步，他对海啸同志说：“我们要离开平阳到外地去工作，不把你带去，又不放心，怕你被敌人抓去杀头；若把你带去，这里留下的队伍和工作又需要人负责。这事使我们左右为难，也就睡不着了。”此情此景，现已八十多高龄的海啸同志回忆这一往事，还很动感情。正因为如此，他的部下对他也是十分爱护的。一九四一年六月，刘英同志到浙南特委检查工作，我也跟着去了。有一天拂晓，到了平阳凤卧乡赤砂，布置好岗哨，大家都入睡

了。特委书记龙跃同志因为刘英同志在这里，老是担心，无论如何睡不着觉，拂晓就起来亲自到哨位眺望，发现对面山岗的竹林里有几个人影。哨兵以为人数不见增加，又没有行动，估计是打柴的，并不在意。龙跃同志不放心，立即派人前去侦察，才发现了严重敌情。原来敌人正分五路向我们驻地包围过来。他立刻向刘英同志汇报。在刘英同志率领下，我们甩开敌人，顺利作了转移。当时机关里所有的枪支加起来也只有二十多条，而且大部分是短枪，而敌人的兵力超过一个团。如果不是龙跃同志出于对领导人的爱护，及时发现情况，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两次“不眠”的往事，不是很能说明上下级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吗？

刘英同志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时常为人称道。他与粟裕同志一起，打了很多仗，都打得很好，影响也很大。当年苏联的《真理报》上，就登过挺进师打胜仗的消息，这些，都已是人人皆知的事了。当年同志们之间，经常讨论、学习刘、粟二位领导人的指挥艺术，大家都很有佩服。同志们反映，粟司令往往一声令下，长途奔袭，乘其不备，一举全歼敌人，打得痛快淋漓，大获全胜。而刘英同志则紧逼敌人隐蔽下来，与敌人打圈子捉迷藏，麻痹疲劳敌人，冷不防打他个措手不及。象古代一些名将往往有着许多轶事一样，游击根据地里也流传着刘英同志观察细致、机敏过人的一些故事。一天夜行军，远处树林中宿鸟惊飞，刘英同志立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果然避开了敌人一次伏击。另一次行军，路上有一堆马粪，刘英同志用手一摸，还是暖烘烘的，就立即断定敌人过去不久。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民群众与战士对于作为军事指挥员的刘英同志，是很信赖的。

对于敌人来说，刘英同志是个可怕的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第八区（即温州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宝琛和副司令陶建芳给浙江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黄绍竑的报告中说：“瑞、平、泰三属及闽北寿宁、福鼎等县，自刘英股窜入以来，约有十年（注）历史，中经张司令发奎，刘司令建绪，李司令觉，肖师长冀勉，蒋故司令志英及其他高级将领，率领大军，亲自到地征剿，虽迭有斩获，究未

能尽绝根株，其剿办之难奏肤功，于此可以概见。”的确，蒋介石对他自己老家的共产党，不可谓之不重视，张宝琛所说的高级将领，有几位在国民党中还是所谓“名将”，而且用上了很大的兵力，但对付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竟束手无策，徒呼奈何！以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纲向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不得不哀叹：“平阳北港区完全赤化，为全省人士所注意，大有浙江‘陕北’之概。”在敌人的眼里，刘英同志是如此的“神出鬼没”，甚至当他在温州被捕后，浙江中统头子刘怡生向浙江省诸军政要员汇报时，刘建绪还说：“过去好几次都说捉住了刘英，结果都不是，这一次难道是真的？”敌人的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英同志的机智和才能。

作为我党长期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人，刘英同志有着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这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讲得完的。刘英同志的一生革命活动中，当然也有缺点，工作中也会犯错误，但是瑕不掩瑜。刘英同志一生的光辉事迹，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与纪念。

刘英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注：原文如此，其实到这时仅七年。

高尚的阶级友谊

——纪念刘英同志殉难四十周年

龙 跃

我党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被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于同年五月十八日在永康方岩慷慨就义。今天是刘英同志殉难四十周年纪念日，我谨表示深切的悼念！

刘英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优秀党员。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是红军中一位年轻能干的高级干部，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他与寻淮洲、粟裕等同志一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经过闽浙两省一直打到皖南，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胜利会师。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被七倍于我的敌军包围，刘英、粟裕同志奉方志敏同志之命，率领军团直属机关、部队的一些人员和一部分伤病员，还有四个没有子弹的重机枪连先期突围，历尽艰辛，终于胜利地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化婺德地区，并找到了闽浙赣省委。接着，他与粟裕同志又奉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中央军区之电令，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长征后，白色恐怖笼罩南方各省，而浙江省又是蒋介石的老家，反动基础十分雄厚。当时，只有五、六百人的红军挺进师，能够从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中突围出来，在浙江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领导者如果没有共产党人那种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显然是不可能的。红军挺进师在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又遭到敌人的反复“围剿”，特别是一九三五年秋至一

九三六年春和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曾两度遭到超过自己几十倍兵力的强大敌军的“围剿”，我们终于胜利地坚持下来。同样，领导者如果没有共产党人那种独特的胆略和气魄，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红军作为新四军的组成部份之一，开赴前线抗敌。刘英同志奉党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领导原红军挺进师的一部份干部和浙南地方干部，留在浙江继续坚持斗争，开展工作，他与当时从各方面来到浙江工作的党员干部一起，很快地打开了浙江工作的新局面，不但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党的建设也取得较大的成绩。

我是在一九三四年三月调到红军第七军团工作时，认识刘英同志的。那时候，刘英同志是军团政治部主任兼军团三人肃反委员会的委员，我在保卫局担任技术书记（即机要秘书）。一九三五年六月我担任挺进师政治连政委，跟随刘英同志搞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创工作，后来，我又担任闽浙临时省委特务队（短枪队）政委并兼做刘英同志的机要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起，我担任浙南特委书记，到刘英同志牺牲前首尾九年，我一直在刘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政治上得到他的关怀和培养，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并且彼此都很了解。今天回想起来，无尽的往事涌上心头。

一九三五年一月部队在怀玉山突围时，前有敌军堵击，后有敌军追击，我军又处在敌人的封锁网里，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我们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担任前卫，军团领导人乐少华、粟裕、刘英（他们在谭家桥战斗前和谭家桥战斗中都曾负伤）和我们在一起突围。当我们冲向最后一道封锁线，敌人从碉堡里向我们猛烈射击时，前面有一丈多高的山坎挡住去路。我第一次往上爬时，掉了下来，第二次却一跃而上，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刘英同志用左手把我托上去的，我想伸手拉刘英同志上来，他向我摇摇手，然后抓住一株小树也一跃而上了，当时，我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在那样紧急的时刻，刘英同志不顾右手的伤痛，先照顾他人，后顾自己，这种高尚的阶级友谊，使我终生难忘！

我还听刘英同志讲过他自己的一个感人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二九年，刘英同志参加了红军第四军，分配在供给部工作。不久，被提拔为出纳股股长。部队行动时，他跟军需运输队走。有一次，部队从闽西回师赣南，经过瑞金他的老家附近，有一个挑花边（银元）的运输员挑不动掉队了，他就帮着挑。部队到了宿营地好久，发现少了一担花边，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来，有人猜测是他与那个运输员私分花边开小差回家了。直到熄灯号吹过，只见刘英同志满头大汗，挑着重重的花边，同运输员一起回来了。刘英同志这种忠于革命，忠于职守的精神，立即得到领导上的表扬与同志们的称赞。

刘英同志本来是一位政治工作者，不是军事指挥员，但他却很会指挥打仗。在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他与粟裕同志有时分开行动，有时会合在一起。分开行动时，各自都要一面对付敌人，一面领导地方工作。那时我是随刘英同志行动的。他的魄力很大，很果断，指挥打仗干脆利落。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刘英同志带着司令部的特务队三个班约三十来人，在泰顺东北部和瑞平泰边搞根据地建设工作。有一天住在泰顺白姑湾，浙保独立第十大队一个连由平阳方向来进攻我们，敌人已经到了我们驻地下面的竹林子里。我们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敌人正面进攻，离开我们只有三十米左右了，刘英同志站了起来，右手一挥，用瑞金的土话喊了一声“抹下去”（打下去），我们一个冲锋就打垮了敌人，俘虏了敌军官兵几十名。有一个十四岁的红小鬼也跟着冲下去抓俘虏，一个敌兵欺他年纪小，打了他一记耳光，这红小鬼就咬住敌兵的手指头不放，敌兵只好乖乖地缴了枪，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还有一次是在福鼎与泰顺交界的鼎泰区检查工作，刘英同志只带了特务队两个短枪班约二十来人，群众称之为驳壳队。有一天住在福鼎县城附近的南凤山，敌人也是一个连来进攻，我们迅速撤到后面山上占领阵地，刘英同志以一个班在右侧打掩护，一个班打正面。敌人离得很近了，刘英同志同样一声号令“抹下去”，右侧用冲锋枪一扫射，正面的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向敌人，只二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还缴来一挺轻机枪、数支步枪和一箱子弹。后来又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

短枪队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由二十多人发展到近百人，武器主要是短枪加轻机枪配以手榴弹，部队的战斗力很强。瑞、平、鼎、泰之间的敌人只要听到刘英的驳壳队来了，就龟缩到碉堡里去不敢轻易出来。广大群众则把驳壳队看成是自己的亲人，每到一地与群众打成一片。那一带的老人，直到现在还记得驳壳队英勇作战的事迹。

在建立与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同志每到一地，总是亲自深入做群众工作，同时重视统战工作，善于跟地方上的长辈和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打交道。他经常找一些人开座谈会，一方面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一方面调查社会情况。浙南地区包括福建的福鼎等县在内，语言很特殊，主要讲闽南话和温州话，此外还有畲族话，都很难懂。我们初到浙南地区，简直像到了外国一样，群众的方言一句也听不懂，他们也不懂我们的话。向群众作宣传、借东西、买东西，都要用手势来表达。后来刘英同志调了两名会讲普通话的本地干部在身边，让他们作翻译，向他们学本地话，把本地方言与普通话一一对照，注上音，抄在小本子上。他反复背诵，用心记，后来能够听懂，也能讲几句闽南话和温州话了。这样，他与群众更容易打成一片。当年老区的群众见过刘英同志的，至今还经常怀念他。

刘英同志很重视当地干部，把培养与团结当地干部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看待。记得一九三五年夏在浙西南，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浙南，红军挺进师先后有一部份干部转到地方工作或兼任地方的领导职务，刘英同志专门找他们开过会，反复说明培养、提拔、团结和爱护当地干部的重要性。他说：“红军挺进师要在浙江和浙闽边站稳脚跟，开花结果，完成党中央给挺进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没有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当地干部来，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刘英同志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刘英同志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给我的教育很深刻。这一条是我们过去创立浙南革命根据地和坚持浙南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

总之，刘英同志自一九二九年四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牺牲，一贯来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为党为革命作了出色的贡献。他的牺牲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

刘英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种种折磨，始终不屈，大义凛然，最后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刘英同志这种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刘英同志殉难已经四十周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的国家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又迈出了新的长征步伐。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在纪念刘英同志殉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要学习先烈们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实现四化建设努力奋斗！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八日

缅怀刘英同志

顾 春 林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猖狂反共，丽水城内，军警特务多如牛毛。省委在丽水时间一长，蛛丝马迹，总不免有点暴露，再耽下去，显然有危险。所以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省委机关从丽水搬到了温州。同年九月，我从丽水调到省委工作，住在温州西郊柑桔园中王阿三同志家里。跟在丽水一样，刘英同志住在什么地方，省委在温州还有那些联络点，我都不知道，但跟刘英同志见面的机会

比过去要多。刘英同志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到阿三家来，一般总是上午到，吃了午饭，午后离去。刘英同志喜欢热闹，平易近人。到的那天，阿三特意添上两个菜，他跟阿三全家和我，大家围在一起吃，有说有笑，亲如家人。刘英同志是打扮成大商人模样来的，举止大方，仪态端庄。他头戴呢帽，身穿藏青色哗叽长袍和浅色毛料裤子，足登皮鞋，衣襟右上方别了金笔，左腕带着手表，左手无名指上戴着金戒子，右手拎了一块包着东西的手绢——这是为了掩盖他食指负伤后不能弯曲的引人注目的特征。在只认衣衫不认人的旧社会，这样的穿戴，谁会怀疑他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不，是中共闽、浙、赣三省的特派员呢？（这个新职务是刘英同志亲口对我讲过的。）

在省委，刘英同志一再谆谆教导我要抓紧时间学习，阅读些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列主义书籍，如新出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之类。的确，在刘英同志督促下，在温州的几个里，我确实看了一些书，得益不浅。刘英同志不仅在政治上关心我的进步，也关心我的身体健康。他经常说，干革命工作是艰苦的，没有健康的身体不行。他一面说，一面拍拍胸脯：“你看，我多好，我的胸围是滚圆的！”刘英同志目光炯炯，脸色红润，声若洪钟，精力充沛。在革命同志中，难得看到象他这样健康的身体。我当时身患两种病：一是疟疾，三天两头发热，弄得面黄肌瘦；一是疥疮，满屁股的脓血，坐卧不宁。刘英同志不惜化了很多钱，一定要我到医院去治疗。我先是住进天主教会办的董若望医院（俗称白姑娘医院）治疟疾，静脉注射了几次奎宁针，一星期左右就痊愈出院；然后又住进瓯海医院治疗疥疮，洗了澡，混身涂一种黑药膏，赤身裸体裹着白被单睡三天，起床再洗个澡，也就彻底治好。医好这两种病，对我来说，实在如释重负。

刘英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很乐观，这大概同他的革命经历有关。每当完成一项任务，不论是大任务或小任务，他总要说：“我们胜利了！”这几乎成了他不离嘴的口头禅。据说刘英同志小时间读书不多，可是谈吐之间，我了解他懂得不少古文。他喜欢写字，